



青年学术文库 | Youth Academic Library

中国乡村治理中的 政治传播与控制

>> 李 广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青年学术文库

中国乡村治理中的政治传播与控制

李 广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乡村治理中的政治传播与控制/李广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607-3792-8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农村—群众自治—研究—中国

②农村—政治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D638②D4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5241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1/32 7.875 印张 216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资助

Independent Innovation Foundation
of Shandong University, IIFSDU

信息化:正在改变农民及乡村治理的逻辑

(代序)

无论在中国出版史上还是中国发展史上,1984年无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这一年,商务印书馆、新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不约而同地出版了三部“未来学”著作,它们是: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走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三部著作都以生动、细致而充满睿智和历史感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发达国家的“发达”、现代社会的巨变,及未来社会的走向。这一切是如此的“新奇”,犹如三声惊雷,让封闭很久的国人心灵震撼,眼界大开!

尤其是从这些著作中,不少人首次了解到“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样的概念。不过,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且仍处于工业化或前工业化时代的国人来说,“信息社会”离人们的生活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多数人仅仅将此视为“他国的故事”或“未来的构想”。三部著作也仅仅是作为“未来学”而引入国内。

然而,在此后短短的二十多年,“信息社会”不再仅仅是“未来”的“故事”,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现实”。曾经仅少数人拥有并具有明显的权力、身份印迹的电话已经广泛地进入平常百姓家。多数人未能见识的手机、电脑、宽带、网络等等已经广泛地使用。截至201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突破了4亿关口,达到4.2亿,10月份,全国移动电



话用户也已经达到 84204.4 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每百人 62.5 部,固定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 22.6 部。总体上看,“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信息化的水平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的发达地区一较长短”(《中国信息化形势分析与预测 2010》)。

毫无疑问,改革后的中国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信息社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信息化浪潮之中,我国的农村和农民也深深地卷入其中。2009 年末,99.86% 的建制村已通电话,开通互联网的乡镇比重提高到 99.3%,开通互联网的行政村比重提高到 91.5%,农村网民数首次超过 1 亿。2010 年 10 月,农村移动电话用户近亿户(9993.4 户)。农村的信息化也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

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无疑是人类社会“最具有爆炸性的转变”,“其深刻程度不亚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化”。阿尔温·托夫勒将此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次浪潮”。

对于当今的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无不深切地感受到骤然而至的信息化浪潮的冲击及由此带来的变化。然而,对此感受最为深切的莫过于我们的农民了。因为,如果说信息社会是人类社会自“农业社会”经“工业社会”之后的“第三次浪潮”,那么,我们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从“农业社会”跃入“信息社会”!

当我们行走在今天的乡土大地上,在辽阔的田野、茫茫的群山以及无际的草原之中,我们都可能见到“卫星小锅”散布在农人的房舍、山民的小屋和牧民的毡房之上。虽然当今仍有一些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往日“孤陋寡闻”、“土头土脑”的乡民了。深山老林的山民也可能与你一道讨论中央的政策、美国的大选、非洲的足球以及近期国际水果的价格走势,打扮入时的青年可能哼着刚刚在城市流行的歌谣从你身旁走过,而年迈的大妈也可能正用手机与远方的姑娘诉说家常!

这无疑是一个全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曾经的“穷乡僻壤”在信息和网络平台上已不复存在,城市与乡村、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以



及个体与群体跨越时空交集交融在一起。尤其是我们看到，信息化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使农民与整个社会及世界联为一体；信息化让农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的精彩，也不断传播现代民主、法制和权力观念，唤醒他们深藏内心的平等、自由、权利和尊严意识；信息化让农民也直接聆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缩短了政策传递的时差，不断消解着乡村权威的神秘性和盲从。这些表明，乡村的信息化正在改变农民思考和行动的逻辑，也在改变乡村经济社会运行及乡村治理的逻辑。

一万年前的农业的发展消灭了群居部落、群体狩猎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代之以城邦、君主王国和封建帝国。300年前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财富，当蒸汽机普及，大烟囱在田野上耸立起来，农民从田野进入工厂，乡绅和地主也失去昔日的权威，传统的君主帝国土崩瓦解。在新的信息时代，“创造财富的新系统的出现，削弱了旧权力系统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

无疑，三十多年前阿尔温·托夫勒等人的上述判断不仅在发达国家获得证实，也正在我国广阔的乡村得到印证。随着信息化的迅速发展，“一场新的足以改变世界的革命正在进行”。只不过，当今中国乡村发生的变化似乎更加猛烈，出人意料。

在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农民及乡村的变化无疑也是这个国家最深刻的变化！

我国乡村信息化及其引发的变革已经引起不少学人的关注和研究。然而，也许是由于乡村信息化过于迅猛，人们在惊叹之余还来不及进行理性的总结，迄今的研究成果依然有限。尤其是对于乡村信息化及其社会政治后果的深入分析少之有少。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李广博士的著作多少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中国乡村治理中的政治传播与控制》是李广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撰写的。作者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完成其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硕士研究生期间，他的专业就是信息技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他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在本书中，他力求分析和解释乡村治理中信息传播以及不同的传播方式对于乡村治理的影响。应该说，他的目标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在他的著述中，他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中信息传播的机制及其变迁，也分析了不同背景下信息传播的机理及其后果。毫无疑问，他对信息的分析本身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信息，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乡村治理的逻辑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对于一些有所成就的学者来说，青年时代的博士学位论文常常是其走向成功的坚实台阶。如果说李广博士已经成功站上了第一级台阶的话，我相信，也希望，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他会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行，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项继权

2010年12月15日于梅南山居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传播内容的选择与控制	(33)
第一节 政治传播的社会基础:合作化思想的产生与传播	(33)
第二节 政治传播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合作化思想早期探索与实践	(42)
第三节 建国后合作化思想的确立与传播控制	(57)
第二章 合作化思想的传播与接受	(68)
第一节 政治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	(68)
第二节 会议—文件系统:合作化运动中的组织传播	(80)
第三节 农村有线广播:合作化运动中的大众传播	(93)
第三章 政治传播的结果与绩效	(113)
第一节 传播的个体影响:合作化运动中的中国农民	(113)
第二节 传播的国家影响:人民公社治理体系的形成	(122)
第三节 传播的社会影响:“组织起来”的乡村社会	(134)
第四章 转型中的政治传播与国家整合	(144)
第一节 历史考察:政治传播的转变与制度变迁	(145)

绪 论

一、研究的缘起

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结构一直是以农村为主体的，整个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逻辑，总是与其息息相关的。而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虽然大大加速了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但农村社会仍然处于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主要位置，只不过城市社会在整个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步地凸显出来，并且由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特殊制度，造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但这样的格局并不妨碍农村社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是以农村社会为主体而发展运行的社会，所以，对于中国的研究，无论哪一方面，都绕不开对农村社会的研究。

另外，作为一名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我们总是很自然地意识到自己是“新中国”的一员，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种意识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地增强的，作为政治学的研究者，这种身份认同的形成机制一直是笔者的兴趣所在。当笔者乘车北上，或者南下，或处繁华都市，或处穷乡僻壤，真正地感受到我们的中国是如此庞大，如



此的多样,同时也生出了一点困惑,中国这一“民族国家”^①是如何形成的?国家是如何将如此宽广多样的地域、如此庞大的百态众生整合在一起的?如此的困惑伴随着笔者在政治学领域中施施而行。

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之后,在前辈学者的影响下,笔者将目光更深入地投向了广阔的乡村社会。中国的乡村社会研究恰如一座巍峨的宝山,走在其中无意间就能够发现宝藏,前辈学者的宝藏无时不让我涵泳玩索,使我深深体会到乡村研究的重大意义。十几年来,中国的农村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社会科学的研究也相应地重心下移,政治学研究的“贵族”倾向逐步向“平民”转变,学者们逐步认识到看清中国首先要看清中国的农村,解决中国的矛盾和问题首先要解决中国农村的矛盾和问题,农村才是中国真正的主体,学术研究的演变也就是合乎这简单逻辑的现实映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中国学界从事乡村研究特别是乡村治理研究的重镇,笔者有幸进入这一优秀的研究团队中后,在前辈学人的指引和影响下,自然也就对乡村治理问题投入了较多的关注,将其作为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在这期间,我也逐渐意识到对于乡村政治的研究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更重要的是带有深切的现实关怀。而我之前的困惑也一直伴随着我的学习和研究。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十几年来,这个社会也逐步地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这个词语给这个时代赋予了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仅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而且还改变了亿万人固守的观念,它甚至宣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信息革命”、“信息社会”、“信息爆炸”、“信息技术”等等一系列和“信息”有关的词语无时不充斥于我们的耳畔,它似乎魔力般地刻印进了我们这个时代。它提供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野,也因

^① 这里所用的这一概念显然与西方学者眼中的概念不尽相同。这里的“民族”是着眼于近代才出现的“中华民族”这个词的,在时间意义上是特指清末以来逐渐建构起来的现代中国国家形态的。事实上,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远远超前于西方现代国家的,我们国家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以及独创性政治体制,很早就形成了具有共同认同感的共同体,虽然古代中国有边陲而无边界,而在当时囿于交通并与西方无接触的情况下,这并不足以成为“民族国家”的一个必要条件。



此它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特别对于我自己,由于具有特殊的专业背景,当我从原来的信息技术专业转入政治学领域后,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它对于我的影响,我也就自然地运用这一新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也自觉地将“信息”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纳入到乡村治理研究当中,由此我也惊喜地发现信息科学和传播学中的很多观点和概念对于一些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问题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基于此,以及自己的学术困惑,两者的合力使我很自然地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来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

作为一个新的名词和概念,现代的人们使用“信息”如同使用古老的词语“天、地、水、火”一样地自如,但如果深入地探究一下,却又感觉含义模糊,说不清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可以与它联系起来,耳闻目睹的是信息,鼻嗅舌尝的是信息,感觉到的是信息,认识到的是信息,以信息的眼光看待世界,似乎一切都成了信息。在哲学上,学者们将其和物质、能量并列,认为三者是构成客观世界的三个基本要素。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没有信息,事物的运动便无从谈起,而没有运动的物质和能量是不存在的。物质与能量的相互转化,只有依靠信息的媒介作用才能得以实现。对于本文,作者无意对繁多的信息定义作比较梳理,而只是针对于政治学领域选取了一个最适合的定义加以运用,因为政治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所以本文的信息含义仅限于社会信息(或称之为“人类信息”)。针对于人类,学者们给出了一个哲学意味的定义,那就是“信息即人的精神产物的外化和内储”^①。

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一切的文化形态和意识观念形态都可以归属于信息这一范畴之内,这样一来,政治学范畴内的有关社会化、影响、说服、控制、国家建构等议题便可以通过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视角来重新看待。

进入中心后,为我从政治传播这一新的角度研究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的导师项继权教授非常支持我的这一研究思路,并在

^① 居延安:《信息·沟通·传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多次交流中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意见和指导,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起来。中心主任徐勇教授也对我多次鼓励,并说明了这一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范围非常广泛,并且多学科的介入,使之更加纷繁复杂,在研究内容上,包括乡村政治变迁、村民自治、村庄权威、村民选举、政府转型、公共服务、农民负担、基层民主、农村政治信任、农民维权等等;在研究方法上,也由原来较为单一的研究方法向多种研究方法发展,既有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也有实证研究、定量研究,还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作为探索性成果之一的本书,不可能将乡村治理研究中所有的内容都涉及到,只能着眼于那些适合政治传播视角解释并可以解除笔者学术困惑的那一部分内容。学者们一般认为传播的类型可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人的内向交流(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际沟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组织传播(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本书所研究的传播类型限于后面的三种,从这一视角来审视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国家整合。时间上,笔者将重点放在了新中国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上。从对这一过程的考查中,我们将看到政治传播在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形成和转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本书无意于在政治学领域构建一新的理论范式,仅仅想把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引入到现在的中国农村研究领域中来,期望能够提供多一面的透镜去看清当今的中国农村,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时有一个更为准确的判断。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在阐述其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的著作《政府的神经》中,应用了维纳的控制论思想,提出现在的政治研究视野应转向“沟通”和“控制”理论,应重视“信息”在政治系统中的作用。他指出以往政治学研究多关注于“权力或强制力”(Power or Enforcement)以及与之相应的“强迫”(Compulsion),而现在应将“信息”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① 在此著作中,他将“信息”、“反馈”和“传播”作为他沟通理论的核心概念,建立起政治系统

^① Karl W. Deutsch: *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The Free Press, 1966, p. 151.



的“沟通”和“控制”的分析模型。延续他的研究,中国的少数学者也开始意识到政治沟通研究视角的意义,复旦大学的胡位钧博士在他的研究中就引用多伊奇的思想理念,指出,从信息沟通的视角,我们将不再把眼光局限于怎样的政治体制或多大强度政治行为的建立和发生,而是这些体制和行为所表达的意愿否能够精确地传输给接受者,并引起预期的回应。并且,我们的研究视野也不再局限于显性权力组织或个人,而是“移向了隐性的或潜在的组织和民众,使政治凝聚力、政治的冲突或一致不再仅仅简单地表现为掌权者的命令,或突兀地显现在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而是广泛地、持久地体现在国家、政治或社会组织、民众相互间的信息传播项目上,而通过对其沟通的广泛性和精确性的测算,可以发掘出能够有效沟通并达成共识的潜在领域,并依此对政治系统结成一致行为所具有的可能性作出评估”^①。

虽然他对于沟通理论中的精确测量表示怀疑,将研究的视角侧重于政治个体和组织传输政治信息的宏观构架和传输能力上,而不是对信息进行所谓科学的计量,但这毕竟是国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本研究同样也是因循行为主义的理念方法,从信息沟通的角度研究现代中国乡村的整合问题,虽然这样的视角和方法有受到人文主义者们对“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批评的危险,但目前来看,每一种研究范式和方法都有其缺陷,我们并不强调范式和方法的完美性,而是更注重这种范式和方法对于研究议题的适合性,本研究即是对此观点的实践。

二、研究的现状和文献综述

学术研究总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而进步的。对于本文的选题,大体来说涉及到了以下的研究内容:一是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一是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以及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对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以下便大体遵循着这一思路对前人的学术研究进行简单的梳理。

^① 胡位钧:《现代国家中的政治沟通——中国社会政治整合的变迁与重构》,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17页。



(一) 政治传播的研究

政治传播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信息论”首先由克劳德·艾尔伍·申农(C. E. Shannon)提出。1948年，他发表了代表作《通信的数学理论》，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申农认为“通信的基本问题是在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者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信息”^①。

他还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通信模型，表现了通信的过程及其内在的相互关系。信源发出信息，经过编码变成信号，信号进入信道，开始传递，传递中会受到干扰，这样从信道末端传出的信号就增加了噪声因素。最后通过译码将信号变为信息送入信宿。信息论的信息是一个具有哲学概括意味的范畴，按照申农的定义，信息就是能够消除或者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在信息论中，信息被视为客观世界的第三大要素，而与第一大要素物质，第二大要素能量相并列。就是说，世界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者构成，这就是信息论对哲学认识论的重大发展。1948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发表了《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标志着控制论的创立。控制论同信息论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控制论的关键在反馈，没有反馈便谈不上控制，而控制论所讲的反馈就是信息反馈，因此，信息论乃是控制论的基础。事实上整个控制论包括三大部分，即信息论、反馈论和计算机理论，控制论的基点就是把控制系统当作一种信息系统，并推广至人类社会，就如其在书中所说的：“毫无疑问，社会系统是一个像个人那样的组织，它是由一个通信系统联结在一起的，它也有它的动力学，其中具有反馈性质的循环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②

三论中的系统论大致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并没有一个像申农、

① C. E. Shannon: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Reprinted with corrections from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Vol. 27, pp. 379-423, 623-656, July, October, 1948.

② [美]维纳：《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页。



维纳似的前驱者,它是由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先后提出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一般系统论的提出者路·冯·贝塔朗菲,由于他的系统论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所以他的理论又被称为“人文系统论”。系统论的基本构想集中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之中——“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乃是系统论的精髓。^①

系统论既涉及到信息传递,也涉及控制,故钱学森曾说过,所谓“三论”其实就是“一论”,它们都统一于广义的系统论。

政治传播研究源自传播学领域。传播学融合了“三论”的理论,吸收了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从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五个层次,对人类传播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传播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不像其他学科一样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它的理论来自各种不同的学术领域,而这些理论为政治传播的研究开拓了视野。恰如迪恩·巴朗德(Dean Barlund)所说的:“许多学科的研究都受益于对传播模式的运用;反过来,这些学科也同样加深了我们对人类传播的理解。”^②

政治传播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间并不是很长,而它所涉及的范围却很广泛,相关研究的学者对政治传播究竟包括什么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有的学者偏重政治信息的产生、传递与接收的行为层次,有些学者重视政治体系中政治组织、大众媒介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也有的学者将范围扩大到国际传播的全球体系。也由于政治传播是一门新的学科,所以众人对它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较有影响力的定义是英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Brian McNair)所给出的,他认为政治传播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它涵盖了:所有政治人物及政治行动者为达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非政治人物对政治人物作出的传播活动,例如选民及报纸评论员;所有在媒体中有关政治人物及活动的报道、评

① 参见[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9页。

② 转引自[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